

统筹城乡进程中丘陵山区 村落空间重构机理与途径探讨^①

王 成, 费智慧, 张玉英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统筹城乡改革与发展实践加快了城乡间要素流动频度和村落空间异化、同质化进程, 针对丘陵山区这一特殊环境, 完善与创新其村落空间重构理论既利于稳定和优化乡村村落空间发展引擎, 又利于统筹城乡改革发展配套试验区发挥示范作用。本研究运用系统学原理, 从资源整合角度出发, 将农村居民点建设植入乡村环境这一系统, 融贯“自上而下”政府引导与“自下而上”农户需求, 探讨村落空间重构机理及途径, 创新村落空间重构理念, 旨在完善丘陵山区村落重构理论和“以人为本”和谐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村落空间重构; 机理; 途径; 统筹城乡进程; 丘陵山区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68(2014)7-0096-07

村落作为乡村聚居社会的环境载体或生存发展的容器, 是乡土社会的实态表征, 并始终伴随着聚居社会的发展而变化^[1]。传统村落当前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战略的多重驱动下, 正经历着由缓慢演进向突变转换^[2]。尤其自 2004 年以来连续 8 年中央 1 号文件对“三农”问题聚焦以及“十二五”规划的进一步强调, 城乡间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更为频繁^[3], 农村经济发展步入急遽转型期, 农户兼业化、生计来源多样化, 收入持续增长, 农户自行建房日渐增多, 旧居、新房交错排列, 一户多宅^[4], 村落空间中心衰败、外围扩张无序^[5]等趋势更加剧了村落空间演化, 传统的村落空间秩序迅速被打破, 农户多元化需求与目前村落空间环境制约严重困扰了村落空间重构, 如何引导村落空间有序发展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6-9]。近年来, 尽管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为主线的村落空间建设在改善农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不少地方采用“一刀切、大集中”的形象工程代替新农村建设^[10], 涌现出“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 只见新屋, 不见新村”, “均质化、标准化”等村落空间格局现象且不断蔓延^[11]。可见, “缺乏引导的农户随意化”与“忽视主体需求的城市社区倾向”的建设方式均不适应于当前村落重构需求。丘陵山区所具有的特殊地域环境, 较为封闭、复杂的村落空间, 长期以来面临的交通闭塞、生态脆弱、人口增加等压力, 加之当前快速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等战略的多重驱动, 正经历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成为村落衰败与更新较频繁的区域, 丘陵山区村落空间体

① 收稿日期: 2013-04-24

基金项目: “十二五”农村领域国家科技计划课题“西南山地村镇生态型土地与景观整治技术”(2013BAJ10B07-04A);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基于共生理论的西南丘陵山区村落空间重构机理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XDJK2013B023)。

作者简介: 王 成(1974-), 男, 重庆荣昌人,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农村发展的研究。

系各个层面旧有的形态结构逐步解体,农户自发与政府主导的村落建设兼具合理与不合理,代表进步的同时也充斥着矛盾,如何协调农户需求、政府引导、区域环境已成为当前丘陵山区村落空间重构面临的重大难题。因此,本文针对重庆市特殊地域环境,将政府外力引擎作用和统筹城乡进程中农户对村落空间的差异性需求相融贯,探寻既满足农户真实需求“自下而上的反馈”,又能充分发挥与“外力”引致作用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植入”相匹配的村落空间重构方式,探讨村落空间重构机理及途径,旨为丰富与完善乡村地理学理论,为村落空间合理、有序重构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为“个体”走向“系统”的宜居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供新的视角与实践借鉴。

1 统筹城乡进程中村落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重庆市作为我国最大最年轻的直辖市,西部经济建设的中心,且兼具“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带大库区”的区域特征,自 2007 年被国务院批准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以“巴渝新居建设”、“农村危旧房改造”、“农民新村”为主的新农村建设形式在重庆市得到广泛展开。截至 2012 年 9 月,我市已完成“巴渝新居”建设 42 022 户、竣工农民新村 253 个、农村危旧房改造 79 793 户(D 级危房 25 101 户)。通过这些统筹城乡发展新举措的落实,我市农村居民点“散、乱、差”的“满天星”局面得到一定改善。但在村落重构及新农村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在丘陵山区特别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受地形地貌影响,其农村聚落单元多以“农户农村居民点+承包地”相对封闭的不规则的“满天星”式布局,零乱无序,即便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村落也大多以“院子”形式进行简单集聚,规模相对较小,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大,利用效率低,基本设施的建设成本高。课题组针对统筹城乡进程中村落重构面临的机遇与问题,设计农户生计、土地利用、土地流转、住居现状的满意度、土地规模经营、集中居住意愿、是否参与户籍制度改革、是否参与居民点复垦形成地票 8 大项 387 个小项问卷,运用参与式农户调查方法^[12]于 2009 年 5 月—2012 年 4 月对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陡梯村(农业结构调整区)、重庆市合川区二郎镇兴坝村(纯农生产区)、重庆市铜梁县虎峰镇久远村(土地整治区)和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城郊区)4 个不同类型的村进行实地调研,共发放问卷 2 168 份,其中有效问卷 2 100 份,有效率 96.86%。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整理与分析发现当前重庆市村落建设中除上述共性以外,由于丘陵山区复杂的地貌环境差异、农业经营水平的差异以及农村建设项目的差异,不同类型的村落还呈现出新的特征:(1) 农业结构调整区农户的生活方式和住房建设消费观念急剧扭转,生产方式彻底改变,新技术、新材料得以推广,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基本配置,从而使得渗透着地域本土精神的传统村落形式难以满足农户的现代生活模式,传统的村落空间形态成为了无用的空壳而被遭废弃;(2) 纯农生产区农村居民点功能已从传统从事农业生产、生活的纯粹性聚落单元(即以“农户农村居民点+承包地”相对封闭的不规则的“满天星”式布局和以“院子”形式进行简单集聚的村落)日益向农村经济与社会组织的载体转换。这一社会功能的转变将加速村落空间由过去的“同质同构”向“异质异构”转变,村落空间的格局、要素、结构和组织关系等方面呈现出加速变动和重构的趋向^[13];(3) 土地整治区因农户未来生计来源不同而导致的农户住居需求、未来发展诉求与担忧等方面的差异是农户开展农村居民点建设消费的出发点和决定因素;(4) 城郊区城乡间经济、社会、物质交流的日益频繁促使农户生计多元化,农户家庭收入持续增长,对土地经营由传统生存需求转向消费需求,受传统“先安居后乐业”思想影响,改善居住条件已成为当前农户消费性投资首选,且更加关注乡村建筑实体的美观程度、居住空间的舒适性及其生活功能的完善程度、乡村景观的协调性^[14-15]。受到政策影响和经济驱动,重庆地区不同类型农户的经济条件、社会意识及居住观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不同农户群体的共同作用之下,村落环境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户根据自身条件及意识形态自发建房,导致了诸如土地浪费、环境破坏、建设混乱等问

题,现实的窘境、农户的需求、满足农村居民点新的社会功能的需要,都昭示着探索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村居民点建设新理念,既有利于农民幸福生活美好家园的建设,又能充分发挥统筹试验区的示范作用。

2 统筹城乡进程中丘陵山区村落空间重构运行机制

重庆市作为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沿阵地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区,其乡村村落重构运行应针对村域特色前景,基于“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和“区域—住区—邻里—宅院”层级整体性原则,实施“创造集聚条件、提升发展条件、保障生存条件”等策略,把村落空间重构主体的“互联、互动”、村落空间资源的“互补、互通”和服务环境的“互利、互信”融合在一起,实现形态、结构和性质各异的多元化系统结构的和谐运作,建立重构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村落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

(1) 重构主体的“互联、互动”。建立“政府指导、农户参与、利益攸关者为补充”的组织框架,采用“自上而下”政策引导与“自下而上”农户需求融贯方式,以功能引导和利益协调为主线,既发挥各自的优势,又克服各自的资源限制和功能局限,性质不同、功能各异的各类主体在实现各自目标时,充分考虑系统整体目标,真正达到 $1+1>2$ 绩效。在村落空间重构运行中,充分发挥政府引致功能,将地票改革实践与引导村落空间重构相融贯,坚持农户自愿、依法变现农户“沉睡资产”,缓解农户资金短缺矛盾;政府以户籍制度改革实践促进村落空间重构时,通过完善社保、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确保“农转城”后农户的生计保障能力,消除满足转户条件农户的后顾之忧,为村落空间的重构腾出空间;政府以产业构建与发展促进乡村村落空间重构,加快土地流转,转“传统农民”为“职业农民”,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逐步引导农民自主参与村落重构。

(2) 村落资源利用的“互补、互通”。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村域,人口规模小且分布较散,人文环境、人工环境主要以点状、低密度镶嵌于自然环境中,资源利用率较低,加之资金、人才等物质性资源和信息、知识等非物质性资源流动有限,农民建设基本上各自为政,呈现出资源共享性差,重复建设性高。在村落空间重构运行中,充分发挥土地整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整村推进等政府“外力”行为,打破资源在区域内的流动障碍,降低资源流动成本,实现资源的畅通流动和相互补充,各村落空间单元间实现“同类资源共享、异类资源互补”,改善村落单元和区域的“短板效应”,提高村落资源的利用效率,引导资源围绕村落空间实现优化配置,发挥系统整体功效。

(3) 服务环境的“互利、互信”。服务环境要素是村落空间重构框架运行的必要条件。营造“互利、互信”的服务环境,降低服务主体实现互联、服务资源实现互补的社会成本。村落空间重构的运行关键首先是尊重农户这一重要的村落重构主体,尤其是不同类型农户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在各类主体间形成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其次是政府要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践行者,规范自身在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中的行为,规避主宰作用;再次是各利益攸关者从农户利益出发,形成“农户—政府—利益攸关者”互利互馈机制。

3 统筹城乡进程中丘陵山区村落空间重构理念构建

丘陵山区村域作为乡村宜居人居环境建设的前沿阵地及农户生产生活消费的场所,伴随统筹城乡不断推进与深入,在城乡间生产要素交换频繁与城市文化影响加深以及新的经济因素和外来文化进入农村的强刺激下,一定状态下的由乡村自然环境所形成的自然环境子系统和人类活动所形成的人工环境子系统、人文环境子系统所构成的乡村景观系统相对稳定、平衡状态已被打破。但就短时期而言,乡村自然环境子系统相对稳定,人类活动作用所形成的乡村人工环境子系统和乡村人文环境子系统发挥着主要作用。正如金其铭等人^[16-17]认为乡村景观的核心是聚落和土地利用观点相一致。村落重构是在外源驱动要素和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强刺激下,村落发展主体对村落空间体系重新建构,促使系统各个因子完成优化组合的过程^[18]。在这一过程中,村落发展主体按照某种物质或者非物质联系不断竞争与合作,其理念构建必须充分

考虑人类活动与乡村环境。而当前不断涌现出的“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规模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的“上海三集中”模式^[19]、“就近并点、迁弃归并”的“江苏近郊综合开发”模式^[20]及“城镇化引领、中心村整合、村内集约”的“山东空心村三整合”模式^[6, 21]等乡村发展建设理论,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强调“自上而下”城市社区规划理念和“一刀切”的实践模式;研究区域的选择和模式的推广大多集中在我们北方平原^[22]和东部沿海地区^[23],缺乏对地理条件特殊、生态环境脆弱、村落衰败与更新较频繁的西南丘陵山区的研究;多从村落空间体系中的某一个空间或空间内部的构成要素展开,对村落发展主体间互动关系和共同需求考虑尚少等不足。因此,本研究基于当前农村聚落及空间重构理论,针对重庆市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村落发展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将农户农村居民点建设植入乡村景观建设这一动态系统中,基于村落空间重构与乡村环境融合,继承并发展历史文脉,居住区与生产区相间布局、有机结合,创新新型村落空间重构理念。即从战略思维层面上,既须满足不同农户生产、生活需求,还须考虑农户所在村域的空间层次,实现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取得 $1+1>2$ 的效果;从战术选择层面上,基于“政策主导与农户需求”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融贯思路,根据国家的发展战略、乡村发展与农户需求对乡村资源(包括城市支持资源)重新配置,突显乡村发展特色与核心竞争力,寻求资源配置与农户需求的最佳结合点。这一创新理念既满足当前农户改善居住环境愿景及其农村居民点建设消费所呈现的新特征,又能充分利用现有政府“外力”,旨为乡村宜居环境建设的实现创造条件。

4 统筹城乡进程中丘陵山区村落空间重构运行框架设计

统筹城乡进程中丘陵山区村落空间重构运行框架不仅要展现在特定经济条件、政策背景以及乡村环境约束下各重构主体的认知,还需反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体现乡村环境系统优化。针对当前重庆市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村落建设存在的问题,基于村落重构理念,从系统学角度出发,融贯“自上而下”政府引导与“自下而上”农户需求,诠释村落重构运行机理,这一过程为创新村落空间重构提供了理论源泉与现实平台(图 1)。(1)农户尺度。农户农村居民点建设消费对于农户而言,是一项投资费用高,消费周期长的特殊消费行为,生计状况特别是未来生计来源情况已成为农户消费的资金保证与原始动力^[24]。不同后顾生计来源^[25]决定着农户建设消费的诉求,一方面受制于村域自然环境子系统、人工环境子系统和人文环境子系统,另一方面受制于农户自身生计状况和未来生计来源。因此,村落重构不能单纯把农户视为一体,而必须根据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动态划分农户,并针对其需求进行乡村环境建设,为“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实创造条件。(2)田块尺度。村落空间重构主要源于聚落与土地利用改变,农户生产空间与居住空间的重构已成为当前村落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对土地利用已从最初满足自身生计需求转向消费^[26],提高土地利用技术与管理实践,增强抗风险能力,增加土地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也成为农户首选。而农户开展土地利用这一转变事关村落重构的发展方向。村落重构就生产空间而言,应充分考虑农户间土地流转,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基础设施的共享。其居住空间建设既要满足农户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变^[27],又要尊重农户传统的地缘亲缘关系,提高农户对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性。(3)村域尺度。农户作为农村经济建设的微观行为主体,受市场导向和政府宏观调控影响,农户经营结构转型(种植方式、管理实践、种植模式等)^[28]和住居需求差异导致了农户间、农户与政府间、农户与企业间的利益冲突再现,农户为满足自身需求,其土地利用外部不经济呈扩大化趋势,这一异化特征将加剧乡村人工环境、人文环境趋于多样化^[29],农户改善出行、耕作、住居等条件与村域建设矛盾突出。为此,村落重构将农户建设植入乡村建设系统,通过扩大政府“外力”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提高便民服务水平、增加农户受培训机会等方式提升各重构主体间的交往空间,并将农户需求反馈与政府外力支持整合构筑重构路径,从农户生产、生活需求角度厘定重构单元,融合各单元间相互辐射与连通作用,既满足农

户需求又充分利用政府、利益攸关者等“外力”，在保障农户利益前提下，盘活土地收益，促进农户持续增收，为“以人为本”的宜居乡村村落空间重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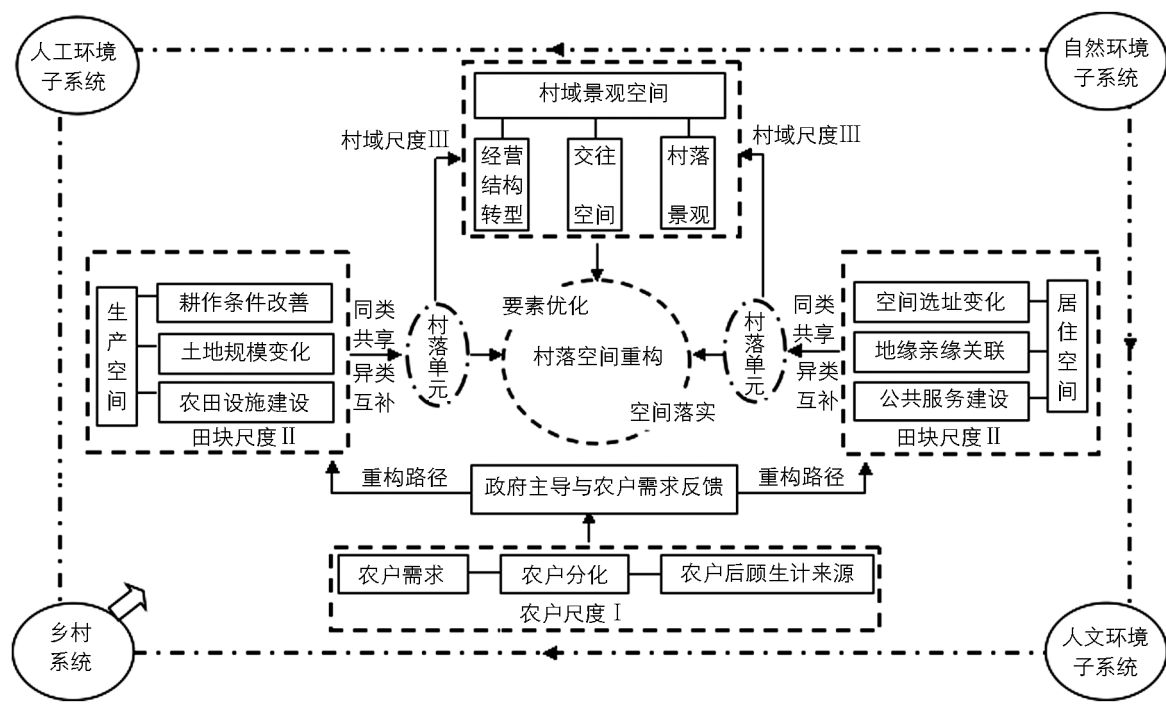


图 1 村落空间重构运行关键设计框架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系统学入手，构筑融贯“自上而下”政策引导与“自下而上”农户需求，突显农户主体地位的村落空间重构新理念，既考虑到了当前农户“扩大住房面积、改善住房条件”这一主要需求，又充分发挥了“外力”的触媒作用。村落空间重构通过资源整合，以农户后顾生计来源的差异动态分化农户，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户的需求与现实政策“外力”支持，基于农户收入渠道多样化以及农户经营土地由传统满足生存向满足消费转变这一特征，引导传统农民向“市民”与“职业农民”转化，构建村落空间重构路径，初步厘定空间重构单元。在此基础上，构建“自然—人文—人工—政策”相契合的“以人为本”的村落空间重构框架，既能提高农村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又能为“现代文明+传统继承”村落重构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据这一创新理念，针对城乡统筹进程这一特殊背景，对丘陵山区村落重构提出以下建议：

5.1 以政策为引导 以农业生产为主导构筑村落空间单元

基于“重庆地票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实践构建村落空间重构路径，转农户“隐性财产”为“显性财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按照“小集中、大分散”原则，突显其居住、商用和旅游休闲功能。以交通干道为轴线，重构单元沿其分布，形成“串珠”型的社区型居住空间重构单元；以连续不断地分布于道路一侧或两侧形成“流线”型乡村社区居住空间重构单元；在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构建“环抱”型乡村社区居住空间重构单元；利用城镇中心强辐射能力，发挥“公租房”优势，吸引非农专业化发展型、非农多样化发展型农户转户，完善基础设施，构建以城镇为依托的“块状”型、“团状”型乡村社区型居住空间重构单元；根据产业发展特点，结合农户间土地流转情况，转“传统农民”为“职业农民”，以农业生产最优耕作半径、农户从事农业工作最优为核心，构建小集中多连贯的“块状”、“团状”、“散居”为一体的农业生产型居住空间重构单元。

5.2 村落空间重构时充分体现“同类农户资源共享 异类农户资源互补”

村落空间重构时既要考虑重庆市不同区域特殊农宅建设的社会化，又要注重到村落空间内部（起居、

厨卫、圈养等)布局 and 空间重构单元间公共资源(晒坝、燃料、服务设施、生产空间、生产资料等)共生能力,同时,使同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配置保持相对一致,异类农户的配置保持一定的差异性,有助于同类农户资源共享和异类农户资源互补,按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生活需求,结合乡村景观环境,确保村落中农户间信息交流、公共资源共享与维护共担、生产经验、管理经验共享,促进村落社会化发展。

5.3 树立生态和生产与生活整体协作观念 打破行政界域概念 强调地缘经济关系作用效应

重庆山水资源构成了具有重庆地域特色的生态景观格局,环境复杂、敏感,村落空间重构须注意顺应村落原有的空间肌理关系,结合村域内需要保留的建筑物和道路所构成的现状人工环境要素,同时,村落的人文环境是长期生活在该空间中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积累,是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的区域所特有的意识观念和生产生活形式,所以体现地域文化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形式将获得农户的认同感,更加满足农户在精神层面上的需求。考虑空间重构单元与重庆市村域特殊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等)、人文环境(市场、行政、科教、医卫、商服等)、人工环境(交通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等)的关系,通过“社区集中型”辐射“组团型”、“组团型”促进“块状型”、“社区集中型”与“组团型”逐步带动“带状型”空间单元重构乡村村落。

参考文献:

- [1] 雷振东. 整合与重构: 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 [2] LONG Hua-lou, ZOU Jian, JESSICA P, et al. Analysi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J]. Applied Geography, 2011, 31(3): 1094—1105.
- [3] 龙花楼. 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 [4] 龙花楼, 李裕瑞, 刘彦随. 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J].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203—1213.
- [5] 刘彦随, 刘 玉. 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J]. 地理研究, 2010, 29(1): 35—42.
- [6] LONG Hua-lou, LI Yu-rui, LIU Yan-sui, et al.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 Fueled by ‘Increasing vs. Decreasing Balance’ Land-Use Policy for Dealing with Hollowed Villages [J]. Land Use Policy, 2012, 29(1): 11—22.
- [7] LONG Hua-lou, LIU Yan-sui, LI Xiu-bin.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J]. Land Use Policy, 2010, 27(2): 457—470.
- [8] KELLY E C, BLISS J C. From Industrial Ownership to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s: Tenure Change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entral Oregon [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12, 25(11): 1085—1101.
- [9] JESSE B, ABRAMSA B, HANNAH G. The Politics of Marginality in Wallowa County, Oregon: Contesting the Production of Landscapes of Consumption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1): 30—37.
- [10] 葛丹东, 华 晨. 论乡村视角下的村庄规划技术策略与过程模式 [J]. 城市规划, 2010, 34(6): 55—59.
- [11] 刘彦随. 中国新农村建设地理论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12] 李宏伟, 刘秀华. PRA 在土地整理项目中的应用研究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8, 33(6): 57—61.
- [13] 李红波, 张小林. 城乡统筹背景的空间发展——村落衰退与重构 [J]. 改革, 2012, (1): 148—153.
- [14] 刘之浩, 金其铭. 试论乡村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演化 [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1999, 22(4): 120—123.
- [15] 房艳刚, 刘继生. 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过程与机理——以山东曲阜峪口村为例 [J]. 地理研究, 2009, 28(4): 968—978.
- [16] 金其铭. 中国农村聚落地理 [M]. 江苏: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
- [17] 金其铭, 董 新, 张小林. 乡村地理学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0.
- [18] 龙花楼. 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 [19] 李 荣. 我国城镇密集地区农村聚落发展趋势研究 [D]. 北京: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7.
- [20] 曹恒德, 王 勇, 李广斌. 苏南地区农村居住发展及其模式探讨 [J]. 规划师, 2007, 4(2): 18—21.

- [21] 陈玉福,孙 虎,刘彦随. 中国典型农区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 [J]. 地理学报, 2010, 65(6): 727—735.
- [22] 刘彦随,刘 玉,翟荣新. 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及整治实践 [J].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193—1202.
- [23] 刘彦随.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J]. 地理学报, 2007, 62(6): 563—570.
- [24] 张玉英,王 成,王利平,等. 统筹城乡发展策略下基于生计风险诊断的农户后顾生计来源识别——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龙泉村为例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 38(1): 112—120.
- [25] 王 成,王利平,李晓庆,等. 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居民点整合研究——基于重庆市西部郊区白林村 471 户农户调查 [J]. 地理学报, 2011, 66(8): 1141—1152.
- [26] 骆虹莅,王 成,王利平. 不同类型农户土地意识下的土地利用效率评价——以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为例 [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10(11): 1—6.
- [27] 信贵新,阎建忠,杨庆媛. 新农村建设中农户的居住生活变化及其生计转型 [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 34(2): 122—130.
- [28] 王国敏,陈金龙. 西部农户利益最大化行为对农业环境的影响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31(6): 19—24.
- [29] 张荣飞,王建力,李昌晓,等. 基于 PRA 方法调查的农户对生态移民现状的反馈——以宁夏黄河流域五堆子第一安置点为例 [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 30(4): 157—164.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ways of Village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Hilly Areas

WANG Cheng, FEI Zhi-hui, ZHANG Yu-ying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as speeded up the flow of essential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process of village space alienation and homogenization. In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hilly areas, th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theory of village space reconstruction can not only optimize village space structure but also play an exemplary role of the coordin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form. This study uses the principles of systematics,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places rural settlement construction into the rural environment, merges “top-down” policy guidance and “bottom-up” farmers’ needs, interprets its mechanism and explore its pathways, innovates the conception of village space reconstruc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demonstration to “people-oriented” harmonious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village space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pathway;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hilly areas

